

《伤逝》中的新青年叙事及其语体形态

郑 坚, 王 侃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0)

[摘要]《伤逝》是鲁迅的一篇非常独特的小说,在思想、在语体形态上,它都从时代共名的新青年叙事及“新文艺腔”中脱颖而出,显示了作者无可替代的思想深度和对现代知识青年分裂性、虚妄性的洞察。小说仿拟的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腔叙事语体与鲁迅式哲学的个人化表述之间的冲突,使得其文本的语体形态呈现出内在的驳诘和反讽。

[关键词]鲁迅;《伤逝》;新青年;观念人;叙事语体;现代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3)05-0097-04

The New Youth Narrative and Stylistic Form in *Shangshi*

ZHENG Jian, WANG K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0 China)

Abstract: *Shangshi* is a very unique novel of Lu Xun. In the ideology and stylistic form, it is different with the new youth narrative popular at the time and the new literary cavity, which shows the author's unique ideas, and insight of the fossility and illusoriness of modern intellectual youth.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tyle of the new literary cavity and Lu Xun's philosophy of personal expression in this novel lead to the inner contradictions and irony of its stylistic form.

Key words: Lu Xun; *Shangshi*; new youth; the man of idea; narrative style; modern consciousness

鲁迅在总结五四文学革命时,作了这番描述:“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1]鲁迅所说的新的知识青年是一个具有明显殖民地半殖民地意味的“观念人”,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知识、新观念的传播,培养出这一批“新青年”。“知识”“观念”令置身于前现代蒙昧国度的他们觉醒,辨识出光明的现代景象,又令他们更强烈地感受到周遭的黑暗,而陷入无所依凭的悲哀。中国五四新文学与中国的新青年群体有着极为紧密的互动关系,新的知识分子群体意识的兴起激发了五四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而五四新文

学又反过来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出更多的新青年的自我认同。鲁迅本身是新的知识青年在精神和文学上一个取之不竭的资源库,他的生活方式和写作行为,他对政权的态度,都使之成为新青年的楷模和精神灯塔。但是他自己在描述新的知识青年形象时,总是将他们置于窘迫的困境乃至无望的绝境,表现他们精神的局促和生存的卑弱。《伤逝》是鲁迅一篇“格式”上非常独特的小说,无论在思想、在语体形态上,它都从时代共名的新青年叙事及五四“新文艺腔”中脱颖而出,显示了作者无可替代的思想深度和对现代知识青年分裂性、虚妄性的

收稿日期: 2013-04-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现代中国‘小资产阶级’文学场域研究”(11BZW094);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中产阶层的媒介镜像与叙事框架研究”(11A03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成果(2012M521522)

作者简介: 郑 坚(1972-),男,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影视艺术研究;王 侃(1989-),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影视艺术研究。

洞察。

一 新青年的新生活叙事

陈独秀在《新青年》(《青年杂志》)的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称“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於新鲜活泼之青年。”^[2]展开了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个崭新的现代青年的想象。此后,《新青年》各期还刊载高语罕的《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年之敌》、陈独秀的《新青年》、李大钊的《青春》、朱希祖的《敬告新的青年》等许多标有“青年”的文章;1923年5-6月间《晨报副刊》进行的“爱情定则”的讨论,同年8月《妇女杂志》刊出的“我之理想的配偶”征文启事,以及“配偶选择号”,这些报纸与刊物的编辑运作都可以看作是新观念推动着新生活的表征,对于新潮的恋爱、同居、婚姻、家庭生活的想象和实验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苏雪林的《棘心》、冰心的《两个家庭》、陈衡哲的《洛绮思的问题》等都对新人物的情感、婚姻、家庭生活作出某种想象,但是,那种“新”与“旧”对比的简单模式并不能把握无数不同个体的真实生活体验。鲁迅的《伤逝》可以说是真正深刻地对这种“高品质”的情感生活作了颠覆。

《伤逝》是鲁迅一篇在语体形态和情调上非常特殊的小说,也可能是鲁迅唯一一篇被认为是有浓厚“小布尔乔亚情调”的作品,它讲述新的知识青年的青春婚恋新生活。《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新的文化生产出来的新“观念人”,他们学习到了新的观念和知识,沉醉于传播、实践这些新观念和新知识,并试图由此进入一种现代新生活。

首先,作为进入新文化空间的知识分子,其特征是操有新的词汇、言语和文化符号,小说不吝笔墨体现这一点。例如文中写到“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提到文艺,于是论及《诺拉》《海的女人》等西方作品”;而且“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子君更是会痛快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可以说是“新观念”借他们之口发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3]107-119}新青年男女们获得了来自异域

的现代文学经典、文化偶像和新的概念与术语,他们讲出“新话”,借新的文化资本在自己的小世界构建一个小小的文化区隔。

其二,《伤逝》又是较早直面和袒露新生活淋漓、惨淡景象的小说。子君和涓生以新文化和新观念为支撑,对周边世界做出激烈对抗姿态,但是他们“大无畏”的同居只是被庸众纳入到古老的关于“私奔”的猥亵和轻蔑的认知中。在文化和社会结构仍处于“前现代”的中国,现代教育和传媒产业仅能惠及一小撮飘浮于社会浅表的人群,新的知识青年的个人主义的新观念、新行为要么稀释于庸众惯常的视界,要么面对“无物之阵”做着单方面的激烈而绝望的对抗。至于小说中写到涓生的“工作”,——译书,写小品,并“寄给《自由之友》”,即依托新文学运动成为都市自由撰稿人,更是虚妄和惨淡的。中国社会的前现代性,促使知识青年们簇拥着浪迹于都市,他们中的大部分会迅速跌入梦境与现实的巨大裂谷之中。

二 “新文艺腔”与鲁迅式哲学的语体驳诘

所谓语体是在语言运用上形成的一定的音调、词语、句式、修辞方式等方面的语言特点。^[4]“新文艺腔”,这里是指20世纪40年代初有些研究者对五四以来某些新文艺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某种文风和语言方式(语体)的批评性概括,有论者认为其刻意模仿欧美句式和修辞手法,“装腔作势”“恶俗肉麻”,是一种做作的、不自然的文风,以及与现实语言有一定距离的、书面化的语言方式。^[5]《伤逝》叙述新青年的故事,塑造新青年形象,呈现新青年生存状态,并且在叙述的方式、语体、情境上似乎都体现出浓厚的小布尔乔亚情调和五四“新文艺腔”特色,然而这种表层的语体形态下隐含着作者对于它的颠覆。小说借模拟并反讽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腔”语体来达到自己的叙述目的,模拟一个小资青年的“手记”来进行叙事,使得文本的语体形态出现了内部的冲突、驳诘和反讽。

《伤逝》以涓生的手记为形式,采用当时广为流行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及其“自叙传”的倾诉语调。这种叙述方式在鲁迅的小说中并非绝无仅有,《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都有大量的双重的倾诉成分。叙述人“我”是一个倾诉者,小说中的人物吕纬

甫、魏连受又是一层倾诉者,但是这些倾诉在语体形态上没有冲突感,因为文中主人公和作者本人一样都已经饱经沧桑、看透人世。而一个如鲁迅这样的“世故老人”去仿拟涓生这样的小资产阶级青年进行自叙,其语体形态使得文本内部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对话。《伤逝》的“手记”体,体现一个不谙世事的新知识青年在失败了的新生活后伤感的滥情。例如小说开篇的语句,“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是一种带有浓烈五四新文艺腔的小布尔乔亚“伤感”语体。可是作为小说的真正叙述人——作为“世故老人”的作者自己,给予小说文本以贯常的小布尔乔亚语体不能企及的深刻性。作者一方面在模拟新知识青年的伤感倾诉,一方面又渗入“在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鲁迅式的哲学语体,例如这样的语句:

我们总算度过了极难忍受的冬天,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3]129}

这样的语句是典型的鲁迅式哲学的个人化表述,他是以《野草》中的语体和句式来模拟一个新青年的倾诉。

在《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中,鲁迅曾以其“油滑”的语体形态嬉戏地解构了五四新文艺腔的爱情叙事。这种解构是通过特意设置的语体形态的冲突来达成的:一方面是“我的所爱在山腰”体现的新文艺腔的浮滥诗情,一方面是“回她什么:猫头鹰”体现的“世故老人”的“油滑”。鲁迅本来完全可以用其油滑的语体来解构小布尔乔亚情调的新文艺腔,但是他在《伤逝》中并未如此,他反而用《野草》中《希望》《影的告白》《死火》那样的语体和句式赋予《伤逝》以极其阴郁、寒冷、黑暗的风格,把一个小布尔乔亚情调的倾诉处理得极端的虚妄、绝望,所以,涓生的“手记”是一个语体形态纠缠的文本。“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鲁迅式的哲学及其语体渗入到《伤逝》中,获得了文本表层仿拟的新知识青年的伤感泣诉远不能承载的深刻内涵,一个小布尔乔亚似的“伤感”“浪漫”的新生活叙事被赋予一种与小说中人物不相称的语态。

这与作者自己私人情感生活遭际所导致的情感体验的复杂度有关,也与他精神资源上的芜杂和深刻性有关。鲁迅的生命体验、精神痛苦和紧张、焦灼而奇崛的话语,与五四时代流行的关于知识青年的理想主义、乐观主义式基调并不合拍。

三 “超人”“伪士”与“新路”

有学者认为,早在1907年,鲁迅所作《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集中体现了早期鲁迅的现代思想意识。^[6]《摩罗诗力说》所述的是以拜伦为“宗主”的“摩罗诗派”,被鲁迅涂上了尼采的色彩,做了接近现代思想意识的变形,预示着他自己个人化的对于“现代人”的想象。《文化偏至论》中尼采的“超人”学说对早年鲁迅产生的影响最为突出。鲁迅从这一思想的理路和架构中继承了核心的精神,即以个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为根本要务,而要完成此种确立,则必须立基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必须从个人最深切处出发,仅仅靠引进的西方近代观念,靠流行的种种新式说词,是完全不足恃的。

《破恶声论》其中有“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7]23}的惊人之见,所谓“伪士”一说预见了中国知识青年之现代性的分裂与虚妄。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伊藤虎丸认为:

鲁迅所说的“伪士”,其议论基于科学、进化论等新的思想,是正确的;但其精神状态却如“万喙同鸣”,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唯顺大势而发声;同时,是如“掩诸色以晦暗”,企图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的“无信仰的知识人”。也就是,“伪人”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8]

涓生正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伪士”,身为“观念人”的他们,其新观念、新情感无疑是现代的,然而却是无所依凭的,既非不是自己或民族内心原发出来的,也还没有在社会现实和自己内心找到根基。而同时,涓生又埋伏着成为“超人”式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可能,他已经意识到自身处境的虚妄性。无论是现实的家庭生活,还是自己的精神困境,他都残酷地从中脱离出来,独自觉醒,以至于置子君于死地也不足惜,因为子君在小说中似乎是一

个更无内在生命力和精神力量的女性“伪士”。

五四时代的的新知识青年经历的是被观念启蒙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尚处于脱离现实世界的状态,因而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位置,无从担负起变革现实世界的责任。因此需要获得再一次觉醒,回到社会中探索“新的生路”:

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3]120}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3]126}

在叙述者的语体中,“新路”具有远比阴沉、封闭的“幸福的家庭”壮阔、宏伟、明朗的质感。对于“新路”的模糊想象,表征着中国新知识青年接受西方现代意识的启迪和激发的同时,更要从自身处境中生成,并对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构成重要意义。对于所谓“新说”,一定要深刻地切入信奉者的内心和中国的历史现实处境,以期创造出一个“依自不依他”的中国传统和中国主体。

鲁迅在《伤逝》中对具有新观念、新情感并尝试新生活的新青年“观念人”进行了驳诘和颠覆,其运用的方式,不仅在于叙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绝望故事,更重要的在于他是用自己个人化的充满内部的混乱、分裂、冲撞的尼采式的语体形态来磨砺、诋毁着流行的新青年叙事和新文艺腔。它隐约显现出这样一幅精神图景:个人世界的黑暗深渊与公众的语言(五四新文艺腔)互相捕捉,这之间总是横亘着绝望的距离,但同时又在紧张地对话和冲撞。因此,鲁迅的《伤逝》中,对新知识青年“观念人”自身的批判比对“黑暗现实”和“封建礼教”的批判更为紧要。因为他们空有“现代”“进步”“正确”的新观念,没有立足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因而没有自身内发的强大精神力量和生存能力,只会随着外来新奇的事物和思想的最初新鲜活力的消亡,而枯竭自身的活力,不能从中生长出真正的现代中国的个人和民族主体。^[9]

从五四时代的新青年叙事来看,获得某些思想

和精神,可以说是容易的。比较困难的是,从“独自觉醒”的骄傲、优越感(常常伴随着自卑感)中被拯救出来,回到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伤逝》中“涓生”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自我,就是与环境共生的步入未知“新路”的“新人”,一个在现实及其历史文化情境中的、负有自由责任的“新人”势必真正确立起来的信息。尽管鲁迅一个时期以来陷入了当时风行中国的新青年崇拜,然而他在《伤逝》中借复杂的语体形态展示出来的对新青年的疏离和幻灭,使得五四文学以来的自我孤立的忧郁、伤感的新青年叙事成了问题,《伤逝》在“新的生路”上提供的线索,给予了后人继续进行新时代的新青年叙事和语体尝试以广阔的想象空间。^[10]

参考文献:

- [1]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M]//鲁迅全集: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4-245.
- [2] 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1):1.
- [3] 鲁迅.彷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4] 胡妍.试论语体与文体的关系[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27-30.
- [5] 张梅.上海沦陷区“新文艺腔”讨论的史料钩沉[J].新文学史料,2010(4):120-127.
- [6] 张新颖.鲁迅现代思想意识的内部线索[J].文学评论,1999(1):55-63.
- [7] 鲁迅.破恶声论[M]//鲁迅全集: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
- [8] 伊藤虎丸.亚洲的“近代”与“现代”[M]//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孙猛,徐江,李冬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3.
- [9] 张新颖.现代意识与中国主体[J].中国比较文学,2000(1):37-38.
- [10] 郑坚.现代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9-33.

责任编辑:黄声波